

T17628

陈剑主编

风云丛书第三辑

烈焰中追梦

砂拉越革命的一段历程

黄纪晓著



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风云丛书第三辑

烈焰中追梦

黄纪晓在新加坡南洋大学肄业期间，是南大砂盟支部的负责人，1962年，修完大学三年级后，受令奔赴西加里曼丹从事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从此，高举反帝反殖红旗为实现砂拉越的民族解放与民主独立而武装转战西加和砂拉越境内。历任砂拉越人民游击队政委；火焰山部队司令；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中央第一分局副书记；北加里曼丹人民游击队司令等职。黄纪晓在《烈焰中追梦——砂拉越革命的一段历程》这本回忆录中，娓娓道来是砂拉越革命斗争的血路，是他二十年（1954—1973）革命斗争的生命历程。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他以珍贵的史实和大量历史佐证，为惨烈牺牲的英雄儿女填补历史的空白。

细读这部回忆录全文，发现纪晓是极尽其努力做好按事实讲道理、兼顾史实与个人见解的平衡，在个人情感的抒发中，又不失客观地看待历史问题。总体是希望为砂拉越革命历史留下一个鲜明的记录，不让历史留白。更重要的，纪晓不仅仅为后人保存一份珍贵的史料，而是希图从砂拉越革命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足以为后人所借鉴。

—— 陈剑

黄纪晓所提供的与英国或马来西亚情报机构所能提供的有极大的差异，而这正是这本回忆录的优势。一个平衡而中肯历史书写的综合因素是必须根据众多的史实资料、从各种所能获得的不同的视角、并依据历史与事件所能获取的史实资料做出某种程度的适当的评估。我们深感兴奋的是，现在有了这独特历史记录和相关文件资料，让我们有可能比较和对照其他所能获取的资料。

—— 韦杰夫博士
(Dr. Geoff Wade)



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ISBN 978-967-5832-63-5



9 789675 832635

风云丛书第三辑

烈焰中追梦

砂拉越革命的一段历程

黄纪晓 著

陈剑主编



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新山華族人物誌

編 著：吳 華

封面題字：楊福貽

封面設計：曾玉珠

出 版 者：新山陶德書香樓

39-C, Jalan Maju, Taman Maju Jaya,
80400 Johor Bahru.

承 印 者：康德有限公司

8, Jalan Rosmerah 1/4, Taman Johor
Jaya, 81100 Johor Bahru.

出版日期：2006 年 10 月

定 价：馬幣 RM20，新幣 \$15

烈焰中追梦

作者简介



黄纪晓（1938年12月2日生于古晋），20世纪中叶，为砂拉越独立、民族解放奉献青春。学生时代，加入砂拉越解放同盟，参加学运工作。1960年负笈新加坡南洋大学，曾任南大砂盟支部负责人。

汶莱12.8事件后，他突然受命前往印尼执行革命任务，从此改变生活航道。1964年初，他在印尼完成密集军官培训课程后，“投笔从戎”，在革命武装队伍中工作多年。1965 - 1969年间，他先后担任砂拉越人民游击队政委、火焰山部队司令。

1969年7月，黄纪晓担任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中央第一分局副书记兼任北加人民游击队司令。

他与身边的几位干部，特别重视研究砂拉越的社会情况，以及不断总结革命实践经验。对砂拉越国情及暴力革命学说逐渐加深认识和理解，因此，他们认同通过和平谈判途径，结束多年的武装斗争。他们对1973年突变局势，能够迅速作出正确应变，与平时多做“功课”不无关系。

1975年3月，他在砂拉越西连市镇，从事医疗保健工作。1978年中，他参加筹组该地中华商会并出任多届秘书，同时参加数个华人文教团体的领导工作。80年代末，定居古晋后，曾任多届古晋南大校友会理事，为现届（2012至2013年度）副会长。

作者对北婆三邦人民上个世纪中叶的斗争史实及社会情况，认真做收集资料和研究工作。这本《烈焰中追梦》是作者历史回顾与反思工作的产品。他提供的许多重要且鲜为人知的史料，对有志研究砂拉越这个时期历史的人肯定有借鉴之处。

留取黄花点缀秋

陈剑¹

纪晓是我在南洋大学的同学。他读现代语文系，我则攻读地理。他年长我两岁，但进入大学时，我们都已经是超龄生。我大一的时候，他已经是大三的学长。大家都在文学院的教室上课，偶尔遇上，匆匆照面而过，交谈的机会不多。有时则在学生会举办的集体活动中会面。其时，我与北婆三邦的同学关系不错，时有交往，大家挺谈得来。我虽然读的是地理学，由于活动涉猎所及，对历史学和政治学不仅兴趣浓厚，而且必须掌握这些学识。其时也为着需要常写些这方面的文章。记得我们谈的都是时局相关的课题。纪晓是北婆三邦同学的领导之一，更重要的是，他是南大砂盟南大支部的负责人。他极少参与新马同学主办的各项涉及政治的活动，这是因为砂盟的决策和纪律使然，主要是避免牵涉其中而带来有关当局对三邦同学、特别是对砂盟小组的镇压。他们的目的是清晰的，那就是学习好然后回到砂拉越为砂拉越的民族民主独立运动和革命服务。他在1963年初时突然失踪了，说是回去砂拉越，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他。很久的后来，才知道原来砂盟中央突然指示他，前往西加里曼丹从事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我再见到他时，那已经是40年后，我到砂拉越做田野采访的时节，彼此都已经六十望七的“老人”了。然而，彼此看去都还精力旺盛、精神抖擞、思想敏锐、反应敏捷，表现都还不减当

¹ 陈剑是东南亚左翼历史独立研究员，前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亚洲冷战专题隶属研究员、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年，这让彼此都深感欣慰。我们之间其实有极大的不同，他参与领导砂拉越的革命斗争，战斗在前线，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过来的，而我则在繁华的城市中“安稳”地度过。他所经历的严酷历练，不是凭想象可以了解。

2008年，为着保存和促进对砂拉越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研究工作，我说动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安东尼·李德教授在新加坡举行一次与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前各党要和战士的历史对话会。李德教授与我在澳洲国立大学时有过一次愉快的合作，那就是在1999年成功主办了与马共总书记陈平跟国际20多名知名历史学者的对话会，并出版了《与陈平对话——马来亚共产党新解》一书。为使对话会获得更多支持和顺畅举行，又说动了东南亚研究所所长卡萨瓦巴尼，也参与到这个对话会来。这样，亚洲研究所与东南亚研究所便联合成为这个对话会的赞助单位。纪晓与其他北共领导和成员一开始便给予这对话会积极的支持和协助。对话会成功举行后，我也一再鼓励和催促纪晓书写他的回忆录并祈早日付梓出版。这部回忆录终于完成，纪晓并要我写个序，基于对这个历史的书写职责，更因同学情谊，我义不容辞，慨然应允。

为革命狂飙做历史观察，并为其过程中发生的故事进行审视、阐述、解析、定论是饶有兴味的事，却也是一件痛苦的事。它往往令人深陷在历史呈现与历史史实阐释的深渊之中而难于自拔。历史或已经呈现裂痕，是一种无法消弭的历史存在，面对并再次走过这样的历史记忆，也是一个痛苦的历程。但革命不会随意发生，它是一个具浪漫色彩的集体主义行为，是兼具民族、人民群众、时代、意识形态、历史的错综复杂的、具强大爆发力的整体行动。砂拉越所发生的反殖革命斗争看似地方性的偶发事件，事实上却是世界反帝反殖运动中，处在一个特定时代的势必发生的事件。具有进步思想的时代青年，自然前赴后继肩负起时代重任、自告奋勇地投入这个运动。这些脆弱但却勇敢的个体在理想的指引下，认识到在所处环境的危急存亡的历史关键时刻，形成一种历史意识，不惜一切代价以集体的实际行动去争取民族解放、为砂拉越的民主独立作斗争。

历史不仅仅是时流中事迹的记录，而是理性分析的知识形态。它具有明显的道德取向，展现着对历史现实的理解与价值取向之间的冲突。其所呈现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旨在构成一种认识，作为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动员工具。

革命者是首先站起来对社会不公宣战的人！它必然也要面对、也要忍受更多的打击和惩罚。他所受到的伤害和失败，甚而牺牲生命都在在激发他人的英雄气概，使他们投入到这个革命运动中来。历史学者威廉·布兰查德（William H. Blanchard）在其《革命道德》一书中认为：“无论他是一位改革者还是一位革命家，他活着就是为了改造世界，构筑更好的社会，创制新的人类图景”。他又说：“在反抗政府不公的斗争中，革命者不会仅仅满足于为了推翻政府和夺取政权而去这么做。他一直在寻找超出政治和军事权力之外的某种难于言说的模糊事物”²。

纪晓作为砂拉越革命早期的参与者，备尝其艰辛苦辣的个中滋味。作为怀抱理想的热血青年，纪晓是义无反顾地一头栽进去，参加到革命洪流中去拼搏。有幸存活下来，才有这鲜活的血的纪录。

这里顺便对回忆录这个历史记录形式，谈谈我个人的一些认识。也际此作为阅读、书写回忆录的借鉴。

回忆录是个人色彩浓重、个人情感深厚、主观意识强烈的历史忆述，不应以客观历史的标准和要求去衡量和评判，但可以以客观历史事实作比较审视。主要是权衡史实，客观地对待回忆录对历史事件、人物及当时当地情势的解读，而不主张以“绝对客观”的评述来评论或审判回忆录的主观述说，这是不公平并也失却包容性的鲁莽行为。

回忆录是对相关历史事物典型的“各自表述”或“自我表述”，纯为“一家之言”。读者自有其阅读角度，其或以“先入为主”的意识去解读或“审判”回忆录；不然便是全然以“不知

² 历史学者威廉·布兰查德（William H. Blanchard）著、戴长征译：《革命道德—观玉革命者的精神分析》，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2004，页2-3。

就里”、“不识内里乾坤”的方式、带着开放的姿态去阅读，而后才去对照或印证史实。我以为后者是对待回忆录比较正确的态度，也就是以客观的态度去阅读回忆录主观的阐述。这样也不至于产生“抵触”或“扭曲”的情绪，而更加能够从“第三者”的角度去获得客观的认识。

我们无须过多去期望回忆录对史实保存的绝对准确、公正和客观。必须认识到，个人回忆存在着许多有意无意的讹误、疏漏；抑或是刻意的隐瞒、还是有意的宣扬，抑或是挟私的虚饰、还是实事求是的忆述，都是回忆录必不可免的现实。只要当事者都参与到这历史大叙述中来，参加到存史的过程中来，个体记忆的讹误、疏漏，就会获得最大可能的矫正。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忆述越多，对校正历史记忆所起的作用就越大，而越能呈现历史真实。

回忆录是个人实录，对公众袒露自己的心路历程，也就是把自己放到公共的手术台上，当众自我解剖。如果没有对自己灵魂拷问的勇气，这回忆录就不具备真实和彻底。从人性的角度来审视，回忆录总或多或少有当事人自我合理化的成分在内。这种个人合理化阐述有相对性，差别在于其是否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失。这牵涉着个人的撰述道德底线。有为之者则有把谎言当事实之嫌，无心之失者则还能在事实面前保留自我反省。

我们认识历史的最终目的在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把握历史的发展规律，一方面为现实服务，一方面以史为鉴，以免重蹈覆辙。人们在认识历史的过程中，总不免带着个人的主观思想和观念去判断和评价历史内容。因此，回忆录撰写者在反映历史事实时就难免参入个人主观因素，从而对历史事实作有目的性的选择、重组与阐释，并际之作多维度的解读与评价。

《烈焰中追梦》是一本不同寻常的回忆录。它记载的不仅仅是纪晓从事砂拉越革命斗争的个人经历，不是单纯的回忆片段，而是一段砂拉越革命长达20年（1953-1973）的斗争历程。作为党的重要干部，既肩负着党的重任，也受命为武装斗争的参与者、武装力量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这回忆录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它不仅仅记录了纪晓个人在革命过程中的思路历程，也展示了他

在不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诡谲万变的情势中，机智地协调与化解内部矛盾，以及英勇和果断迅敏地与印尼军方、马方剿共部队周旋、迂回战斗。它诉说了参与的革命同志们的艰辛战斗和苦难，以坦率直接的语言细述了他与同志、战友们历次的险阻和奋斗的决心，也记录下历次的同志们的壮烈牺牲。

这本回忆录所涉及的时间虽短，却含砂拉越武装斗争的前十年，但那却是历史的关键时刻。其所涉及的面也很宽广并有极大的强度和深度。其有外涉的印尼官方、军方、印尼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革命的西加印尼共产党的交接、互动、互助和冲突，更有西加各族人民、特别是西加华族的积极的或消极的参与和支持。内涉的有因历史原因或组织权力分配不当形成的权势角力；又因意识形态分歧、策略与战略、战术的歧异所形成的内部抗争或“不合作”。再有就是革命与镇压一方的政治、军事的对垒、对抗、战斗和牺牲。整体的层面是十分复杂而诡谲的。要想把这错综复杂的情景再现，并试图提供一个清晰的画面，还得把事情原委说清楚，其难度可想而知。特别是每一个个人，不论其神通多大，他也只能是繁复的大历史过程中的一叶扁舟，作为领军、领导人物或能略窥全貌，但具体细节却也无从全盘掌握，故而回忆的特点是时而十分清晰、草缝见针、明辨秋毫；时而却模糊不清、朦朦胧胧、雾里看花。由于纪晓毕竟是上过大学，有过学术研究的培训根底，除在行军转战中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与资料外，之后还广泛收集相关史实，且与当年战友共同回忆，从口述史中汲取养分，并参考有关方面的记载和资料而成就这部洋洋数十万言的回忆录。

作为当事人、又是领导武装斗争的政委、司令人物，纪晓对当时史实的再现和阐述，无疑也深具主观意识的视角，但却是独具一格，其阐释的深度和广度是他人无由替代的。这也正是这本回忆录的价值所在。

它不仅仅是一本单纯的回忆录，在于它不仅仅依靠个人的回忆口述，而是以大量详实的佐证和根据来做历史事件的阐释和对人物的评价。它所提供的作为历史记忆佐证的当时的重要文件、书信、照片和其他直接相关的资料，大大提高了这本回忆录的史

料价值和可信度。在辗转的游击战争中，保存文件和其他重要档案资料是十分艰难的事，纪晓的努力为砂拉越革命斗争史留下了珍贵的史料，这是应该记上一功的。这些佐证与资料阐述着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幕，因而，这部回忆录确是一本鲜活的历史再现。由于它具有浓烈的主观情感，对历史过程娓娓道来，呈现出生动鲜活的特色。人物与事件始末跃然纸上，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了历史的参与感，大大增强了它的可读性、趣味性。

回忆录毕竟是个人凭记忆留下的个人历史记录，它必然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呈现出来的是个人对历史事实和事件的阐释，是一个主观意识的产物。《烈焰中追梦》一书所展现的却与大多回忆录相异，主要便是纪晓采取的阐述角度和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使然。换言之，这本回忆录具有相对的客观性，作者的意图很清楚，那就是要为这段历史留下一个清晰的事实记录，这也就说明大量佐证资料的呈现的必要性。既要保存个人独特的回忆特色，又要兼顾历史事实的真实重现，这绝对是个严峻的挑战！

由于历史过程中出现多个至今仍然说不清的事件，特别是这些事件所引发的连串效应、或造成的后果、或遭致的牺牲、或形成运动历史进程的转向或倒退，基于各种原因，导致众说纷纭，纠缠不清、莫衷一是。当事人对这些事件的阐释就颇令人咀嚼深思。显然的，这本回忆录必然要引起曾经参与或关心砂劳越革命的读者的关注和重视。

对错综复杂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解读和评论，必然要引发诸多争议。这是由于事后产生的情势、效应、影响，以及因时间的推移所形成的“长距离审视”所致；更重要的是各人现今的处境、立场和态度使然。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解读或评论便自然产生“说不清、理还乱”的混乱局面。这就有赖读者从多方面收集的史实、多元的述说和评论来评估、评价回忆录所作的解读和评论，以获得较为可靠可信的认识。当然，这也没有必要一下子“跳入结论”（Jump to conclusion）而让时间去沉淀史实。

惨烈的历史呈现出来许许多多的裂痕，而历史书写无法弥补历史裂痕。这里边有太多的是非和诸多的恩怨，有太多无法承担的事件责任和历史责任，更有无尽的忧伤和凄楚，欲说还休。

细读这部回忆录全文，发现纪晓是极尽其努力做好按事实讲道理、兼顾史实与个人见解的平衡，在个人情感的抒发中，又不失客观地看待历史问题。总体是希望为砂拉越革命历史留下一个鲜明的记录，不让历史留白。更重要的，纪晓不仅仅为后人保存一份珍贵的史料，而是希图从砂拉越革命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足以为后人所借鉴。

08-04-2012

历史学者的佳音

—重要的史实记录与文件

韦杰夫 (Geoff Wade) ³

砂拉越共产党人发动的一场武装斗争，首先是针对英殖民主义者，后来则与马来西亚政府对抗，这史实鲜为人知。部分原因或许是因为被一场在马来半岛发生的类似、但却更持久而强大的运动所掩盖，他们斗争主要目的在于推翻中心设于吉隆坡与新加坡的殖民政权。因此，由北加里曼丹共产党所领导的目的在于推翻英殖民政府对婆罗洲北部地区的统治的事实记载十分粗略，而大多依据英国官方的资料。至今，这场战争最详细的记述只有迪姆·哈蒂 (Tim Hardy) 的一份报告：《内在的危险—砂拉越地下共产组织的历史》(古晋，1965) 和韦农·珀里特 (Vernon Porritt) 的《砂拉越共产主义兴衰史1940-1990》(澳洲莫纳斯大学出版社，2004) 一书。他们基本上都借助于英国官方的资料并代表着官方的立场。一直都很少见到共产党方面的记述，直到最近，一些重要的文件资料才由新加坡学者陈剑、日本学者原不二夫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生成国泉的论述中得窥一二。

现在，有关北加里曼丹共产党资料奇缺的状况已经有了改变。这改变是从2008年11月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举行相关历史对话会开始的。一群学者、北共前领导人及战士在一道公开探讨在砂拉越武装斗争时期，北共的目标和行动。随着1990年和平协议后，他们差不多经过约一代人的时光，到今天才公开

³ 韦杰夫博士是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员、前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亚洲冷战研究专题前研究员。

讲述他们的历史。因而，这正好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审视这些战士。在亚洲研究所的聚会，其对话记录、相关佐证资料以及续后出现的文件档案，有待进一步整理与研读分析。

幸运的，即使在这会议记录刊印前，我们已经获得一些北共重要成员的个人信息以及他们在整个北共的活动与进程中的资料。黄纪晓，先后担任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火焰山部队及北加里曼丹人民游击队的政委或司令，曾积极参与于195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中期砂拉越或后来称为北加里曼丹的共产主义运动并掌握许多详情。他现在愿意将其回忆录公诸于世，让学者们着实获益不浅，而更让公众了解他们怎样在东南亚冷战大环境中从事革命活动。

在书中，我们读到黄纪晓如何在砂拉越参加到反殖学生运动中来。1960年他到新加坡南洋大学深造，也成为这些旅新队伍的主要干部。他从事武装斗争的生涯却是始于1963年，当时，他是10名砂拉越主要干部之一，被选送到爪哇去接受军事训练。

回忆录叙述的重大事件与官方的说法大相径庭，因而让我们认识到历史事实的复杂性以及记述者的主观性。我们必须肯定，这些记录让我们了解北共革命者看待某些历史事件的全新的角度。自然，有一些事件，对双方都十分重要。例如：1962年12月8日的汶莱起义，是英国采取后续行动的重要依据（允许他们在新加坡展开“冷藏行动”）而对北共来说，则是考虑武装斗争时机是否成熟。黄纪晓对这事件及其他历史事件提出他个人的判断和见解，从而提供了我们对一个年轻的、革命的共产党人的思维的认识。

武装革命的可能性在他参与印尼提供的军事训练后很快便实现。军事训练是一项重要的武装斗争准备的步骤，然后，与阿扎哈里等人在西加坤甸联合起来共同斗争。这时期的游击队历史记录，连同印尼军方和外交部在这些计划中所扮演的角色都十分引人入胜。当然，这些关系在印尼1965年9月30日政变以及印尼左翼遭到大屠杀后全都改变。黄纪晓也告诉我们砂拉越革命者对这些事件的想法和反应，以及他们面临的处境。这真是奇妙的巧合，文铭权在1965年9月30日之前飞去了北京。这些情况，以及包括中国在这些塑造着东南亚冷战的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所知微乎其微。

1960年代后期的战士们在森林中的经历记录则比较详细，甚至营寨中日常任务与每个战士所拥有的枪支的记录。这些描述明显展示出游击战士与围剿捕杀他们的印尼军队作战活动的详情。包围、进攻与战斗是由亲身经历的战士来述说，提供的描述是那么清晰，而一般情况下是无法获知的。1970年代，在砂拉越境内建立的基地，以及最后与马来西亚政府和谈的细节也都是由熟知事件内情的参与者来提供。

重要的一点是，这部回忆录提供了一份十分详尽的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的名单，以及许多从未发表过的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和北共的活动照片。这为历史提供了一般无从获得的宝贵的史实内容和资料。另一可贵的一面是，它收集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文件，这包括报告、宣言、声明、章程、条规以及党的意见和政论，这些收在附录中以及若干章节中的附件的文件资料是到目前为止出版物中所见数量最大及难得的结集。

显然的，黄纪晓所提供的与英国或马来西亚情报机构所能提供的有极大的差异，而这正是这本回忆录的优势。一个平衡而中肯历史书写的综合因素是必须根据众多的史实资料、从各种所能获得的不同的视角、并依据历史与事件所能获取的史实资料做出某种程度的适当的评估。我们深感兴奋的是，现在有了这独特历史记录和相关文件资料，让我们有可能比较和对照其他所能获取的资料。

我们感谢黄纪晓经年累月耗费精力详实书写他的历史，为学者与读者大众提供了这历史记录和资料，让大家认识 and 了解作为砂拉越革命者和左翼怎样看待他们为了砂拉越的斗争，以及在将来如何展示他们的历史。

我们也要热忱地祝贺陈剑，他花费了大量精力安排突破性的，在2008年11月于亚洲研究所成功举行的对话会，他不懈地鼓励、安排和提供各种条件和方便，让相关历史书籍，包括黄纪晓这本回忆录，有机会出版。我们期望看到更多的这类书籍的出版，而将这个东南亚冷战时期的政治动乱、政治抱负和愿望、以及社会动荡与变迁等历史状态公诸于大众面前。

2012年4月于新加坡